

繁荣文艺评论

——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文集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繁荣文艺评论

——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文集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繁荣文艺评论: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获奖文集/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7

ISBN 978 - 7 - 5073 - 2601 - 7

I. 繁... II. 中... III. 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9730 号

繁荣文艺评论

——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获奖文集

编 者/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责任校对/董 涛

责任编辑/刘庆旻

版式设计/景 影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680 × 960mm 16 开 18.125 印张 29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2601 - 7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编者的话

2007年12月，由中国文联主办、广东省文联承办的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颁奖式暨2007当代文艺论坛在广州举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振民致信祝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志今，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出席会议并讲话。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颁奖式暨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共有81篇优秀文艺评论文章获奖，其中一等奖9篇，二等奖25篇，三等奖47篇。《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诸版〈牡丹亭〉杂记》、《永远的长征——漫话长征题材的美术创作》等获一等奖；《〈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故事》、《电视剧〈吕梁英雄传〉启示录》、《让相声与时代同行》等获二等奖；《〈尘埃落定〉的人物形象与民间价值取向》、《第五次突破：新百年越剧发展对策》、《〈千手观音〉舞何以光芒四射》等获三等奖。本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文章是在11个全国性文艺家协会、30个省区市文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报送的309篇参评文章中，经初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由评审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的。这些获奖文章是在本届评论奖年度内已公开发表文章中的优秀代表，其共同特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重视对当前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的评析，有独到的见解，文风清新，在文艺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创设于2000年，是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全国性文艺理论评论奖项。评奖的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按照党中央关于加强评论工作的指示精神，评选优秀文艺评论文章，表彰优秀文艺评论工作者，加强文艺评论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推进文艺评论创新和繁荣，促进文艺

事业健康发展。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自创办以来，一直得到中宣部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指导和各团体会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近年来，通过不断完善评奖章程、改进组织工作、积极举办相关学术研讨和颁奖活动等，推出大批文艺新人新作，权威性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促进了文艺理论评论工作的健康发展。

今天，在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作品结集出版之际，向关心、支持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承办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颁奖式暨 2007 当代文艺论坛的广东省文联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中央文献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2008 年 5 月

目 录

一等奖

《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 南 帆（1）

《成长透视——王安忆笔下女性成长研究》 李 晶（18）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诸版〈牡丹亭〉杂记》
..... 季国平（32）

《现代科技手段：一把保护原生态音乐的双刃剑》
..... 韩宝强（42）

《永远的长征——漫话长征题材的美术创作》 ... 许向群（48）

《大曲艺浅说》 刘洛人（58）

《故事村与民间故事保护》 刘守华（63）

《中原厚土》 李江树（72）

《独笑真成梦——黄庭坚书法艺术论》 翁泽文（84）

二等奖

《〈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故事》 邵宁宁（103）

《汪曾祺小说“改写”的意义》 杨红莉（114）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山西三次小说创作
高潮之再审视》 傅书华（126）

	《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	张未民 (137)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军旅长篇 小说十年估衡》	朱向前 (146)
	《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 “苦难”主题》	孟繁华 (156)
	《无名小卒的真实世界——我看梨园戏〈董生和李氏〉》	彭奇志 (166)
	《英雄血，为谁流下咸阳去——论话剧〈商鞅〉的人文 价值、形象体系及艺术特色》	乔德文 (170)
	《着墨主旋律作品中英雄成长——豫剧〈铡刀下的红梅〉 审美视角拓展》	万 素 (181)
	《让中国军人形象绽放新的光彩——2005 年军事题材 电视剧巡略及〈亮剑〉点评》	边国立 (186)
2	《电视剧〈吕梁英雄传〉启示录》	张子扬 (193)
	《烽火中的“大家庭”——电视剧〈四世同堂〉和 〈谷穗黄了〉的比较研究》	赵 彤 (199)
	《琴声中的朝圣之旅——论陈宏宽钢琴独奏音乐会》	杨燕迪 (209)
	《打造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力》	吕品田 (216)
	《寻找新徽派水墨的文化真谛》	封学文 (220)
	《美化城市还是破坏城市》	俞孔坚 (225)
	《让相声与时代同行》	王大胜 (229)
	《危险的失缺》	张 萍 (237)
	《幸与不幸：我们是不是天鹅》	刘青弋 (241)

《民俗场所精神的重建——记杭州清河坊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	袁 瑾 (245)
《从“美”的误区里走出来》	鲍 昆 (254)
《当代书法之冷思考：文化缺失》	陈 智 (262)
《草书性情论》	徐锡澄 (270)
《论沈鹏草书》	韩书茂 (276)
《从杂技节目标题看杂技艺术观念的发展与变化》	刘斯奇 (281)
附录：三等奖篇目及作者	(291)

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

南 帆

—

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至少在文学史上，乡村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对于作家来说，地理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必须转换为某种文化结构，某种社会关系，继而转换为一套生活经验，这时，文学的乡村才可能诞生。土质，水利，种植品种，耕地面积，土地转让价格，所有权，租赁或者承包，这些统计数据并非文学话题；文学关注的是这个文化空间如何决定人们的命运、性格以及体验生命的特征。追溯历史，乡村的文化版图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边界，持续的建构隐含了乡村的复杂演变史，人们甚至积累了多种不无矛盾的想象。现今，全球化与现代性逐渐成为横向与纵向坐标之际，乡村所占据的位置再度产生了微妙的移动和平衡。通常，乡村是一个相对于城市的区域；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开始纳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人们习惯地将乡村视为一个前现代的文本，一块令人头疼的现代性的绊脚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卷入了乡村与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卷入了二者的疏离、格格不入甚至激烈的冲突。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文学之中的乡村隐含了多重涵义——这个文化空间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说，乡村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远未显露。中国古典文学显然是农业文明的一个支脉。乡村意象构成了古典诗词的重要内容。农业文明的特征之一是，人们时刻察觉到自然的压力。体验自然占据了生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落后的交通网络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半径、交往范围和空间经验。多数人如同植物一样踞守在土地上，聆听四季交替的脚步。古典文学深刻地记录了人们对于自然的呼应、契合和感悟、

冥思。“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看来,这意味了诗意的萌动。文学是作家与自然的赠答:“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曾经将这种状况形容为“江山之助”。的确,“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在古典诗人那里,主体与外部的自然甚至形成了某种奇特的情景关系。谢榛的《四溟诗话》认为:“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表示了相近的观点:“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对于古典诗人来说,自然景象是农业文明提供的一个最富魅力的部分。他们不必亲自躬耕于田间,不必担忧旱灾或者洪涝,自然是他们品鉴和寄情的对象。这个对象如此可亲,以至于可以成为他们人生的后门。古往今来,许多知识分子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何谓“独善其身”?远离庙堂,隐于茅庐,放浪于山水,垂钓于江湖,总之,农业文明提供了他们精神的回归之途。“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何等地洒脱和自由。相对于庸俗的、繁杂的甚至凶险万状的社会交往,体验自然无疑是一件心旷神怡的事情。许多诗人终于在自然之中体会到了悠然乃至静穆。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另一种令人心仪的田园生活正在等待他们。“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亲近农事是士大夫的一种大雅若俗的文化骄傲。

如果人们承认,诗词而不是小说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的正统,那么,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种文类似乎与农业文明密不可分。山林泉石,鸟啼虫吟,古道夕阳,野渡扁舟——种种乡村意象密集地汇聚在诗词之中,形成了独到的韵味和意境。诗词难以处理现代社会复杂的网络结构,甚至无法接受各种现代术语。人们很难想象,“车床”、“电梯”、“坦克”或者“机器人”这些词汇如何进入一首七律或者一阙沁园春。显然,这不仅是语言风格的隔阂。这些词汇代表的是另一套文明与感觉体系。当然,中国古典文学对于自然景象的热衷并不能证明,作家只会悠闲地吟诵“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或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而察觉不到深刻的社会冲突。耐人寻味的是问题的另一面:面对不公、不义或者怀才不遇,转身归隐田园或者游历名山大川不约地成为许多作家共有的反抗姿态。乡村的山水和田园成为拒绝权力的象征。这个意义上,最为

著名的乌托邦无疑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确，这里没有制度的批判或者阶级的划分，没有揭竿而起的号召，作家无非是虚拟出一幅安宁和睦的田园生活反讽周围兵荒马乱的社会。然而，这与其称之为逃跑主义，不如说是农业文明造就的想象。这种想象包含了一个秘密的转换：理想的生活就是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转换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然而，中国古典文学并没有明确地将乡村视为一个文化空间。长河大漠，孤烟落日，细雨微风，春花秋月，这一切在文学之中如此自然，以至于如同生活本身。换一句话说，文学之中并未出现另一种相异的文化空间，人们无法根据框架之外的内容察觉框架的存在。“他者”的阙如必然导致“自我”的模糊。相对于乡村的城市并没有显出抗衡的意义。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学并未意识到，城市从属于另一种文化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另一套生活经验。文学从未赋予城市类似于乡村的象征涵义。这个事实多少有些奇怪。远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城市已经成型。《史记·货殖列传》描述了一系列城市在商业贸易之中的枢纽作用。众多城市曾经从各个方向侵入文学，留下了种种遗迹。“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也罢，“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也罢，“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罢，“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也罢，这些诗句无不拥有一个城市的背景；至于《三言二拍》或者《金瓶梅》，小说即是以市民生活作为故事的素材。尽管如此，城市仍然没有给文学提供一种异质的文化，进而对农业文明形成压力乃至尖锐的挑战。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对立并未形成。《红楼梦》之中，刘姥姥在大观园闹出的笑话雄辩地证明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沟壑。但是，这一段情节的意图是制造某种谐趣，是村野老妪与荣华富贵之间的反差产生的喜剧效果——顶多包含一种人生无常的况味。

这应该解释为文学的迟钝，还是解释为农业文明的强大？总之，文学的乡村覆盖了城市；现代性问题远未触动作家的神经。城市被挡在文学的视域之外，并且遵循另一种迥异的结构持续壮大。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不断地积聚能量，仿佛悄悄地等待一个撼动文学的时机。20世纪初期，现代思想的启蒙显然提供了城市再认识的条件。这时，文学终于意识到另一种文化的有力崛起，大门必须敞开。30年代的某一天，当城市从

《子夜》之中迅雷不及掩耳地闯入文学时，它的强悍以及杀伤力令人大吃一惊。久居乡村的吴老太爷眼里，声光化电的上海犹如一个可怖的魔窟——他信奉了几十年的《太上感应篇》顷刻之间完全失灵：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啵，啵，啵！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

.....

4

如果说，吴老太爷的崩溃象征了城市文化空间对于感官的挤压和打击，那么，矛盾的《春蚕》、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开始涉及乡村与城市的结构性冲突。这些小说严格地保持了农民的狭小视角。对于农民说来，城市仅仅矗立在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上，是另一个世界。但是，由于庞大的经济网络联结，城市辐射出的魔力不可思议地操纵着农民的沉浮。这显然是现代性历史的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市的文化空间咄咄逼人，并且上升为主宰。巨大的压力之下，农业文明拥有的生活经验四分五裂。人们可以模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口吻提问：巨轮、火车、高耸的烟囱和摩天大楼可能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存吗？在银行、股票、资本运作和大型购物中心面前，韵味、意境或者“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又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对于乡村的文化清算同时包含了美学意义上的“祛魅”。

意味深长的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仍然不愿意坦然地认可城市与现代性的联系。相反，城市在文学之中声誉不佳。欲望的放纵以及颓废、享乐、糜烂始终被视为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商业习气将一切都置于价格的天平上，社会关系成为利益的账本。的确，文学一直矜持地

回避城市。张爱玲的“复活”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现代文学史上，光怪陆离的“新感觉派”远不如沈从文的“乡下人”风格更有魅力。“新感觉派”包含了哪些前所未有的主题？从《东方杂志》、教科书、《良友》画报到月份牌、《现代杂志》，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形成了什么关系？外滩的建筑物、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构成的文化空间意味了什么？人们曾经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遭遇这些文化现象，然而，它们的文学史意义直至 90 年代才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之中得到集中的考察。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的中文版序言之中表示，这部著作关注的是现代性、现代文学与上海——都市文化的代表——之间的互动。^① 迄今为止，为什么文学与城市的文化空间仍然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必须承认，许多人心目中，文学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是从另一个地方开始的。

二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的小说被视为改造国民性的经典案例，《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的一段自述是人们反复援引的证词。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之中感叹，愚弱的国民只能充当示众的材料和漠然的看客，即使他们拥有一副茁壮的体格。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概括的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文学介入“现代性”的缘起。晚清以来，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以文学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他们看来，思想启蒙是现代性工程的首要环节。

这批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西方文化的器重。他们之间的许多人均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从“问题小说”、知识分子主题到感伤的抒情风格，个性解放显然可以视为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文化的呼应。一种

^①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新型的人物形象陆续出现在文学的画廊上。尽管如此,乡村和农民仍然在作家心目中拥有特殊的分量。蒙昧,保守,贫穷,狭隘,这些性格无一不是“国民性”的表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文学必须将手术刀伸向民族的痼疾。文学对于乡村的关注很大程度地源于鲁迅的表率作用——他甚至成为乡土文学的开创者。虽然鲁迅的小说“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①,但是,对于本土问题的深刻洞察是鲁迅始终保持犀利的重要原因。鲁迅的心目中,农民一直是可悲的主角,与知识分子相比,农民负有更为沉重的枷锁。鲁迅勾画了阿Q、祥林嫂等一系列苦难而麻木的农民形象,这些形象的分量远不是感时伤怀的苦闷所能比拟的。农业文明为主的社会,农民人口众多——他们的精神状态可能成为整个民族的负重。如果现代性包含了多种版本,那么,乡村问题在中国版的现代性之中占有特殊的分量。对于一批现代作家说来,“改造国民性”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广袤的乡村必然要进驻文学。这个时期,文学并没有多少精力考虑城市与现代性的联系。茅盾甚至不无遗憾地指出,鲁迅的《呐喊》——这个时期的杰作——也仅仅表现了“老中国的暗晦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晦里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跳”^②。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无疑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阶级”成为统辖“个人”的一个更高的范畴。这个时候,人们对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的想象必须纳入阶级关系;单纯的启蒙或者改造国民性迅速沦为时代的落伍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的主体部分是产业工人,农民并未拥有最为先进的阶级属性。文学如何判断这一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或者《子夜》这种“全景式”的小说无不涉及这个问题。人们没有理由忽略的是,天才的革命家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设想。^③这种设想之中,农民是以革命主力军的身份登场的。这种设想甚至进入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经典文献之中,毛泽东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

①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② 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20期,1929年5月12日。

③ 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确，毛泽东把工人放在首位：“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毛泽东对于农民的定位是——“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①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格外器重农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将上海作为贬抑的对象反衬延安文艺的生机勃勃。至少在延安根据地，农民的文化情趣占据了正统地位。如果说，鲁迅更多地解剖了农民性格的被动、猥琐、落后，那么，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毛泽东对于农民革命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表示了一贯的赞赏。农民对于文学具有不同寻常的分量，“赵树理方向”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佐证。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赵树理不屑于理会知识分子文绉绉的那一套，他对于章回小说或者评书的借鉴目的是造就一种农民喜闻乐见的风格。这种风格使赵树理荣幸地当选为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标兵，甚至当选为民族风格的代表。迄今为止，许多理论阐述已经形成一个习惯的命题：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基本上等同于民族、民间文化或者传统的形式。换言之，农民时常被无形地置换为民族、民间文化或者传统的代表。必须承认，20世纪40年代文学对于农民的仰视很大程度地源于革命历史提供的再认识：

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赵树理深切地懂得旧中国农民的痛苦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于精神上的被奴役，他最懂得农民摆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的极端艰巨性。这样，赵树理在观察表现中国农民社会时，就有了与鲁迅大体相同的角度，即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考察。但赵树理的时代又不同于鲁迅的时代：这是一个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来摧毁农村封建残余势力、走上彻底翻身道路的新时代。在鲁迅那里还是一个大问号的地方，在赵树理的时代，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些初步答案。因此如果说鲁迅主要是揭露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创伤，以唤起人们的觉醒，赵树理则主要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人的地位及家庭内部关系（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的变化，并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且从这个变化过程中,来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崛起。现代性话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之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 农业合作化是这个总路线的组成部分。这时,毛泽东对于农民的巨大期待再度被引入这个现代性的初步方案。不少人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前景忧心忡忡,他们遭到了毛泽东的讥讽和批评。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毛泽东用这句话形容农民的巨大创造性。当然,夸张的修辞仅仅是一种论战,毛泽东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决心和信心包含了政治经济分析以及一系列相关数据。首先,苏联的经验显示,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的支持;许多方面,二者互相依存。其次,根据某些地区的试验,农业合作化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农民的生活质量开始提高。^③ 不言而喻,这种现代性方案已经充分考虑到阶级角逐的形势发展。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将取消资产阶级的农村自由市场,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彻底孤立他们,这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条件。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论断成为众所周知的名言:“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④

文学理所当然地对这些理论、方针和政策做出了激动的响应。如同乡村曾经是革命的策源地一样,现今的乡村隐藏了现代性的动力。许多作家从天翻地覆的改变之中察觉到某种呼啸而来的生机活力。这极大地触动了他们的文学神经,文学再度集聚到乡村周围。广阔的乡村成为一个硕大的题材,作家竞相从各个角度切入。这时,关注农民的文学史传统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

② 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9页。

③ 参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页、第226页。

④ 参见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6-198页、第117页。

拥有了新的历史内容,文学对于乡村气息的熟悉支持了一系列人物、细节和对话的再现。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围绕乡村的文学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梁斌的《红旗谱》、赵树理的《三里湾》、浩然的《艳阳天》到柳青的《创业史》或者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从孙犁、李准、马烽到王汶石、康濯,这份名单汇成了文学史的一个小高潮。尽管人们仍然发现了那个时期所特有的生硬、粗糙和离谱的拔高,但是,这一批作品仍然标志了当时的高度。相对地说,文学对于“工业化”的历史演变远为冷淡。由于持久地依恋农业文明,没有多少作家认为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比例不正常。无论经济生活之中发生了什么,文学始终没有意识到城市与现代性的深刻联系。文学接收不到城市的真实信号——二者之间存在坚固的屏闭。多少作家真心地仇视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呢?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人们所能看到的是,作家对于城市文化的反感始终拥有一个理直气壮的政治形式。无论是《我们夫妇之间》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城市仍然被视为资产阶级道德败坏的渊藪。如果不是将城市作为嘲讽和批判的对象,文学恐怕早就遗弃了这个赖以生存和运作的空间。

三

9

艾青深情地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土地是许多作家顶礼膜拜的意象,这是“乡村中国”的象征。作家对于山川、田野、村落保持了刻骨的记忆。可是,没有多少作家因为城市的缺席而不安。城市就矗立在眼前,林林总总,为什么作家的感觉体系无法开启?——为什么城市的宏大景观无法真正地震撼他们?

赵园曾经涉及知识分子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她认为,盘桓于城市的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可能存在一种隐秘的愧疚:“那种微妙的亏负感,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踞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① 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贬抑面前,知识分子始终有些抬不起头来。农业文明的直观经验造就了一种“种瓜得瓜,

^① 赵园:《地之子》,十月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 页。